

11.03



87

第五卷

平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平 阳 文 史 资 料

第 五 辑



平 阳 县 政 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74168/26

五
四



苏味朔先生作

目 录

一九三七年国共两党在平阳的和谈·····	游寿澄 (1)
爱国侨领梅仲微先生·····	蔡荣生 (5)
铁骨铮铮的蔡疾呼同志·····	马允元 游寿澄 (9)
黄晋初先生传略·····	黄庆荣 (14)
记原国民党陆军中将陈百村二三事·····	陈 群 (20)
我的父亲沈苑明·····	沈 善 沈叶鸣 (22)
游侠传略·····	卜金池 (28)
黄强先生传略·····	游寿澄 (32)
独具一格的人物画家——忆我师苏味朔先生 ·····	丁文光 (38)
姜子雅和姜品才·····	觉 智 (43)
悼念子雅先生·····	阮树楠 (45)
怀念姜品才先生·····	王建之 (46)
热心家乡慈善事业的陈奕树·····	陈圣棣 吴良祚 (47)
蔡孟平和宣文书院·····	马允元 (52)
悼念我哥蔡疾呼同志·····	蔡孟平遗作 (56)
怀念父亲陈嵘·····	陈振树 (61)

后 记.....	陈振树（71）
缅怀宗一陈臻先生.....	苏步青（73）
日机轰炸平阳县城纪实.....	程卓然（74）
鳌江中西医发展情况.....	叶进生（77）
回忆平阳中学“十学生事件”.....	谢瑞谈（79）
试谈平阳武科.....	陈宜崇（83）
南雁荡山志考略.....	郑立于（85）
记四十年前的一次话剧演出.....	陈承融（88）
平阳三青团初期概况.....	胡锡琰 徐超英（90）
记鳌江一次反对大米涸海资敌的斗争.....	翁奇玉遗稿（93）
对《民国平阳历任知事、县长》一文的商榷	郑中肯（95）

一九三七年国共两党在平阳的和谈

游 寿 澄

(一)

五十年以前，当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侵略中国，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候，南京的蒋介石政府，仍倒行逆施，推行所谓“安内必先攘外”的反动方针，加紧对红军的“围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停止对中央红军的进攻，但仍采取“北和南剿”，任命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边区绥靖主任，调集六个师、两个独立旅以及地方保安团兵力共四十三个团，向浙南游击根据地进行长达八个月的“围剿”。

一九三五年二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突围部队为基础，成立红军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进入浙西南活动。当年十月，他们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会师，建立中共闽浙边区临时省委，以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书记。三七年二月，省委书记刘英率领部份干部来到平阳山门一带进行活动。

(二)

一九三七年三月，浙南地下党派往上海学习的吴毓同志从

上海回来。上海的中央特科让他带回当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要他送交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吴毓回到浙南后，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层层设卡封锁，吴毓无法找到刘英，便折回温州，与临时省委派驻温州的白区工作团团长黄先河和黄耕夫、周饮冰等研究，为了减轻和转移国民党军队对平阳游击根据地的封锁和进攻，他们根据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决定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接触。但是在当年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下，进行接触谈何容易，他们以闽浙省委、军区的名义，拟了一份《快邮代电》于三月廿五日，分头从永嘉、乐清、瑞安、上海等地投邮，向四省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福建省主席陈仪、温州、处州、衢州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有关县党部、县政府等发出呼吁。代电内容：呼吁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派出代表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代电中同时提出以平阳北港的林奎（当年是水头区中心小学校长），温宗周（当年是平阳县党部执行委员）二人作为双方的联系人，并建议对方登报答复。《代电》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连续在《东南日报》、《浙甌日报》上制造舆论，把为挽救国家民族严重危机的提出合作抗日的诚意诬蔑为“投诚”；另一方面派出四省边区主任公署政训处长邓初来温州、平阳进行所谓“收编”的活动。四月三十日在《浙甌日报》刊登了林奎、温宗周的《紧要启事》，示意要闽浙临时省委派人与之联系。

《紧要启事》见报后，吴毓与黄先河从温州经过瑞安，到北港包垵找到刘英同志并向他汇报，共同研究当前形势，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仍占极大的优势，估计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

不大。于是决定了以中共中央二月十日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谈判的基本条件，并决定吴毓、阮铁管、蓝启文三人为谈判代表。会后，由吴毓赶到温州与国民党的代表人物作初步接触，经过协商，谈判定于五月七日在平阳山门礼拜堂（原在山门区小内，现已拆建）内举行。

五月七日，红军代表吴毓等三人来到山门小学礼拜堂楼上，与国民党代表邓切进行正式会谈，在双方同意下，邀请山门小学校长邓扫空，教师代表林伊红（均为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中医师陈明玉等三人作为列席代表。第一天，双方都表达了民族危机深重，非团结不能救亡，非抗战无以图存，表示了和谈的意愿。可是在第二天，进行实质性问题讨论时，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国民党的代表坚持要把红军收编，听候调遣和指挥，政工人员一律解职受训。国民党的代表妄想谈判桌上达到他们在军事上所没有达到的消灭红军和根据地的目的，理所当然地受到红军代表的拒绝，谈判陷入僵局。最后为了争取在政治上的主动，红军代表提出闽浙红军不忍内战的继续，在困难当头的情况下，情愿舍弃一切，开赴抗日前线，要求对方保证行军路途的安全，国民党代表同意向上级请示。五月十八日，在驻苍江的独立旅旅部里，国民党的代表出示蒋介石的“停抚进剿”手令。于是第一次谈判至此完全破裂，国民党立即恢复对浙南根据地的围剿。

（三）

自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闽浙临时省委即发表通电：“生死存亡已到最后关头，应无条件首先停止内战”，再次敦促蒋介石、刘建绪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时

候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八月廿五日红军改名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延安中共中央还以贺龙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同乡刘建绪，晓以大义，敦促他与红军共同抗日。其时淞沪战争已经开始，国民党需从内战中抽调军队开赴抗日前线，促使刘建绪不得不认真对待和谈建议。

八月中，刘建绪将六月上旬在青田的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的原和谈代表陈铁君，从衢州监狱中释放出来，让他带回给刘英的信，同意重开和谈。陈铁君在瑞安沙门山区找到省委书记刘英，汇报了情况，省委决定以吴毓、黄昂（黄耕夫）为代表，八月廿四日，与刘建绪的代表邓切在他下榻的温州中江旅馆进行第二次谈判。顺利地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

根据协议，国民党释放了所有在押的政治犯，临时省委和军区联合发出了《为巩固和平，坚决抗敌告全国各界男女同胞书》。分散于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陆续集中山门进行整训。九月十六日，邓切派了政训处上校处员王裕光，中校处员詹行烈来到山门，会见了临时省委书记刘英，根据情况的变化，将原协议进行修改，达成新的协议。这标志着浙江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四）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国共双方在平阳——温州的两次和平谈判，发生在七七事变前后，这在南方各个根据地中时间是较早的，并取得成功。因此，这次谈判可以作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例。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

爱国侨领梅仲微先生

蔡荣生



梅仲微（1907—1987），字子卿。丁未年阴历十月十八日生于文成县玉壶上村。幼年父母双亡，靠大姐抚养长大。十七岁便开始自食其力。因贫瘠山区生活艰难，于1927年20岁时迁居平阳县鳌江东湖，1932年同陈春菊女士结婚。在旧社会，从农艰辛，经商乏本，为寻找生活出路，于1936年阴历十二月初八日背井离乡，同周迪光，周凤鹤、梅朋对等十位同乡一起，从鳌江港乘木帆船先到福建厦门，转乘洋轮远涉重洋去国外谋生。一到星岛（今新加坡）因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十四位旅伴只得各自寻找出路去打另工，生活十分艰难。后来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加入了施大公司，去马来亚龙门岛日本人经营的铁矿当苦工。他吃苦耐劳，节衣缩食，才能积些钱汇回供养妻儿。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接着祖国河山大片沦陷，中华民族危机深重。出于爱国赤诚，他参加了福建、广东侨胞和在矿华工的大罢工，迫使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日本龙门铁矿停工停产，并奋力抵制运铁砂去日本。这一爱国抗日义举，感动了当时中国驻星岛领事，并博得了中国驻马来亚大使馆的赞赏。他们派轮船开赴龙门接运华工回星岛，并授予

每一位罢工者“爱国工人”牌和实物奖励。

为反对日寇侵略中国，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地代表180余人，代表着43个华侨救亡组织，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集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为“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被选为主席。

南侨总会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梅仲微先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行列。他和爱国侨胞一起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募集支援抗日救国经费等活动，同时还和当地人民一起共同修筑国防工事，保卫新加坡的领土。

1939年8月，梅先生离开新加坡，经泰国经“兰烟筒公司”介绍，随船到了英国伦敦、利物浦。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海员收入微薄，还受敌机扫射、轰炸，生命没有保障。1940年8月27日当轮船驶进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时，梅先生得到旅荷华侨周克雅、薛大贵等同乡的帮助，逃离川英轮船，定居荷兰。当年五月又遇德军入侵荷兰，在战乱中找工作非常困难，为了生存，他只得沿街卖小花生糖度日。从卖小糖到经营棉织品小摊，克勤克俭，艰苦经营，进而与人合伙开设“玉壶酒楼”，逐渐发展到独资经营“天安酒楼”。后来他的事业从荷兰扩展到奥地利。在几十年的艰苦创业中，梅先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使事业蒸蒸日上。

梅老久居海外，历尽曲折艰辛，饱尝栖身异国，遭受歧视凌辱之苦。特别是1946年冬的一天，在阿姆斯特丹市的80多家华侨商摊遭到敲诈勒索，人身和财产受到非法侵犯时，梅老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带领侨胞击退了暴徒，智斗了暗

探，争取了当时中国驻荷兰大使的支持，得到荷兰王国北荷兰省省长的赞许和好评，保全了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赢得了广大侨胞的赞扬。他从自己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侨居海外的华侨为维护自身尊严和正当权益，必须联合起来，团结互助，互相关照才有力量。于是在1947年秋天，梅老和余忠先生等侨胞发起组织了“甌海同乡会”，后发展为“旅荷华侨总会”。同时，深刻地体会到海外侨胞与自己息息相关，祖国是海外赤子的后盾。所以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他欣喜若狂，在侨胞中奔走相告，互相庆贺。梅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荷兰王国还没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他除一心倾向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团结旅荷华侨和发展中荷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了很大努力外，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战火直烧祖国绿江边时，他出于热爱祖国，关心桑梓，又积极参加发动旅居荷兰华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捐款。1954年新中国首任代办抵达荷兰后，“甌海同乡会”立即与临时代办取得联系。随着祖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梅先生深受鼓舞，并积极为增进中荷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发展中荷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1957年国际劳动节，梅老应邀率领旅荷华侨回国观光团，参加了“五一”节的大观礼，登上了北京天安门观礼台，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梅老回荷兰后，精神更加振奋，到处宣传祖国成就，鼓励侨胞心向祖国，关心家乡。1963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临时代办的倡议下，为扩大爱国华侨力量、团结更广泛的爱国侨胞，“甌海同乡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旅荷华侨总会”，会员从原70多人，增加到900多人。1977年10月，梅老又受国务院侨办的邀请，再次率领29人的旅荷华侨回国观光

团，参加国庆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同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频频举杯祝贺。得到很高的荣誉。

三十多年来，梅先生连续五届当选为旅荷华侨总会会长、副会长。一直热心于侨团工作，为团结华侨，服务侨胞，联络情谊，维护侨胞正当权益，兴办华侨公益事业，宣扬中华文化，倡办中文学校，编印《华侨通讯》，引导华侨热爱祖国，关心桑梓支援家乡经济建设，促进中荷文化交流，为增进中荷两国人民情谊，发展中荷两国间的关系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79年，梅老虽以年迈力衰请求辞退，但仍被选为总会副会长、顾问。1984年，全体旅荷华侨又推选他长子梅旭华先生担任总会会长。“雏凤清于老凤声”，如今旅荷华侨总会的会务更加发展，日益兴旺。

梅老先生，德高望重，福荫儿孙，在他亲手培植和扶持下，共有眷属70多人，遍及荷兰、法国、奥地利、西德、美国和香港等地，他开创的事业方兴未艾、蒸蒸日上。

梅老先生身居海外，心系祖国，近年来虽年迈退休，仍时刻不忘援助家乡建设。1979年除同其长子梅旭华汇款20万荷兰盾助建鳌江华侨影剧院外，还出资为家乡筑路、造桥、建亭、修葺古刹，赠送“皇冠”小轿车、“丰田”面包车等。为助建温州大学校舍，他除将自己的养老金拿出1万多元外，还激励旅荷华侨捐建温州大学“爱国”楼一座。

梅仲微老先生在这次返乡探亲期间，因心脏病复发，经多方医治抢救无效，不幸于1987年3月13日上午9时在鳌江梅宅故居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注：原稿承蒙旅荷华侨总会会长梅旭华和外孙女婿张林坤（瑞安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校核，表示感谢。



铁骨铮铮的蔡疾呼同志

游寿澄 马允元

蔡疾呼（1883—1959）同志，是平阳城里雅河街人。祖父蔡维屏，原系博学秀才，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曾参加“金钱会”起义。在起义失败以后，缒骑来到蔡家捕人，蔡维屏从后门越墙而出（后遂不知下落）。这时候，一位长期在蔡家的老佣人丁公，挺身而出，即被清军斩首于蔡家门前。蔡疾呼少时，受祖父事迹和丁公壮烈的殉身精神的教育，熔铸成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屈的献身精神。

蔡疾呼的父亲是药店的学徒，家庭生活贫困，因此，蔡疾呼小时候仅上过三年私塾，后学打银（首饰）。民国初年，曾参加反袁的第五护国军，与军阀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上海应募到法国当了八年的煤矿工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一九二三年，当他四十岁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他因在巴黎参加了援助国内五卅罢工，被法帝国主义者驱逐出境，按照党的指示，曾一度到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回国，在叶挺所率领的独立团里，当过副营长、运输大队长。在参加汀泗桥战役中，他虽负

了伤，仍坚持不下火线。后来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南下到潮州一带作战，因作战失败被俘，他机智地逃到上海，在上海顺泰码头当工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和党接上了关系。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反帝大同盟”在长寿路胶州路口共和大戏院召开大会，号召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反对“淞沪协定”。正当开会时，国民党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当场被捕八十八人，蔡疾呼和其他几位同志，从会场跑到舞台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这里有一堵围墙，没有门。蔡疾呼一进院子，就跑到墙边，背靠着墙，半蹲着，举起两臂，紧张地向同志们招呼说：“快！踏上我的肩膀，跳出去吧！”同志要他先跳，他说：“你们年轻，快出去，可多干几年革命。我老了，应该由我去牺牲”。他异常敏捷地，一把抱住一个年轻的同志，就扛上肩头，送到墙外边，刚送出去一个，紧跟着又送出去一个。到了他拉住第三个时，两人互相推让，彼此都要对方先跳，这个时候，几个警察冲进院子，蔡疾呼就跟这位同志一起被捕了。

被捕以后，他被敌人以“政治犯”关押在龙华监狱，转解南京。在敌人的皮鞭、藤棍、老虎凳等酷刑下，他虽然腿筋都被打断了，但仍然坚贞不屈，敌人判处他十五年“徒刑”，关在苏州军人监狱里。当时他已将五十岁了，同案中绝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蔡老同年青人一样，把监狱当成自修大学，刻苦用功学习，学政治、学文学、学历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他经常勉励青年人，要他们为了革命，抓紧时间学习。有一次，敌人在监内停发“世界知识”刊物，他与其他同志发动绝食斗争，抗议敌人无理勾当。为了改善生存的条件，监狱里要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每当斗争开始，敌人总是企图找寻

是谁带头组织的，如果敌人问倒蔡疾呼所在的号子，他总是挺身而出，掩护别人，牺牲自己。有一次一个同狱的工人把饭倒掉了，敌人大发雷霆，严行查究，他为了掩护那个倒饭的工人，就抢上前去，说是自己倒的，敌人问他为什么倒饭，他严正地说：“我们是人呀！你们为什么经常做有沙的饭给我们吃！要我们不倒，就得把饭做得好好的”，于是就受到一顿毒打。有时被打得两手青肿，或皮开肉绽，还加上一付沉重的大镣。他回到号子里，难友们看到这种样子，含着热泪替他包扎伤口，而他总是微笑着，鼓励战友们再接再厉地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政治犯被无条件释放出狱。他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整整坐了五年牢，走出监狱。就立即奔赴延安，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四岁了。

一九三八年初，蔡疾呼分配到武汉新华日报社担任总务主任。同年秋冬之间，武汉撤退，新华日报向重庆迁移时，他和几个同志带领木船，有一隻在途中被石礁撞沉了，装的纸和铅字、机器等，都沉在水中。当发动船上水手和排字工人下水抢救物资时，天气寒冷，大家有些畏怯，他就用烧酒混身擦一擦，不顾年龄已经五十五岁了，也不顾受伤的两腿疼痛，首先跳下水去，这个行动感动了大家，于是都纷纷下水。经轮番打捞，两三天内，就将沉在水底的东西捞了上来。皖南事变后，他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休养所所长。当时他年近六十岁了，过去在战场上，法庭上，监狱里受过伤，党组织要他到休养所工作，是为了让他得到了适当的休养机会，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 he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上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也不特殊。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帮助饲养员养猪，帮助

工人种菜。党组织发给他的肉和其他食品，他总是请所里同志和一些老战友一起享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九四六年，组织上分配他到承德贸易公司担任保管科科长，在国民党进攻很急的情况下，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他把全部物资带走的任务，他没有丝毫踌躇，夜以继日筹备汽车，忙着催装，深入检查，终于使大批物资安全转移出去。为此，他被表扬为模范科长。一九四七年，他在齐齐哈尔东北财政办事处任物资处主任，团结全体职工，并经常在夜间亲自出去检查，使原来混乱不堪的十多个仓库的物资，整理得井井有条。当年在西满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又被表扬为模范党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调到上海任造币厂军代表和熔炼厂厂长。他在上海任熔炼厂厂长时，为了节约费用，就亲自带领工人搬运东西，虽然年纪大了，走路吃力，但从不后入。库房和工场的门，早上开，下工关，贴上封签，他都亲自动手或检查。特别是，工场里每年有三、四次用硫酸大批地提金，一提就是七八天到半个月，因为气味难闻，许多人一闻就要呕吐，为了照顾附近居民的卫生，他们都是在夜里提，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日夜两班轮流着工作，他则日夜两个班干，有时胃病发作，仍带病坚持。因此，工人都纷纷说：“蔡老不说别的，就这一事，就值得大家学习”。但他说：“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功劳是大家的，我个人渺小得很”。

在上海工作期间，蔡疾呼同志以自己身体力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在职工中树立了模范党员高大形象，他衣服总是自己洗，初到工场时，因为没有厨房，还得自己做饭吃，有时病了，为了节省国家的支出，药费也不要公家报销。为了看守